

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带动地区旅游经济增长了吗？ ——来自文创园区评选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谭娜, 黄伟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上海 201209)

摘要:文化是推动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利用中国在推进文化产业集聚过程中所进行的文化创意园区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对国际旅游经济的影响,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且这一带动作用呈现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带动作用高度依赖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服务业发达程度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条件的支撑。本文的研究对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旅游经济带动效应予以了实证支持,也为不同地区制定恰当的文化产业集聚政策,推动文旅融合,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文化产业集聚;文创园区;旅游经济;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1)01-0068-09

Does Cultural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Policy Boost Tourism Growth? —— Evidence from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lusters Selecting

TAN Na, HUANG Wei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now. Do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policy boost regional tourism growth? With the help of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lusters selecting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e policy effectively drives the growth of tourism especially the domestic tourism development while the effec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effect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 thir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level.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tourism-enhance effect of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olicy, and also provide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different regions to formulate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olic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clusters; tourism grow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收稿日期:2020-05-01 修回日期:2020-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L130);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15CG61)。

作者简介:谭娜(1983—),女,山西长治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经济与旅游经济。通信作者:黄伟。

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已得到多方证实^[1-3]。特别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其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4]。随着人们旅游层次的不断提升,“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文旅融合发展思路逐步成型。为了统筹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2018年中国政府整合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组建形成文化和旅游部,提出了文化与旅游“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发展理念。然而,在文旅融合发展的热潮中,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支撑和科学经验引导,“为融而合、融而不合”等现象不断出现。文化和旅游的最佳连接点在哪里已成为目前文旅融合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思考文旅融合可行途径的同时,我们观察到一个典型事实:文化产业集聚与旅游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很多文化产业集聚区是由一些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或历史建筑改造形成,如由废弃煤矿改造而成的德国埃森矿业同盟工业文化集聚区^[5]和由废旧厂房改建而来的上海苏州河文化创意产业带等,以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独特的文化遗产价值成为人们追求文化独特体验的旅游景点。还有一些地方特色型或休闲娱乐型文化产业集聚区则依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或景观发展而来,其建设初衷在于刺激文化消费,提升文化休闲需求。正是意识到文化产业集聚与旅游发展的天然联系,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将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纳入“文旅融合”的发展框架。那么,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是否确有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区是否能成为文化与旅游的有效连接点?这是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中国在推进文化产业集聚方面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各级政府主要以评选“文创园区”^①的方式来推进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2004年文化部开始开展国家级文创园区评选活动,被选定的园区可享受与之配套的财政、税收、金融及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随后各省与直辖市纷纷出台地方性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并依此进行了多批次的省级文创园区的评选。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恰

好为本文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其原因:一是各地的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出台时间不一,政策出台后文创园区的评选工作逐次进行,且各地的园区评选间隔时间不一、每批评选的园区数量不一。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已有22个省份制定了文化产业集聚政策。这些特征使得文创园区评选活动具有“准自然实验”的良好性质,时间与地区的双重差异保证了本研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合理性。二是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评选的省级文创园区达553家。这些文创园区分布于全国各地,使得本文有足够的“实验组”样本,且样本分布的广泛性能够较好地避免选择性问题。三是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初衷是推进各类文化企业的集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而旅游经济发展并非其根本目标。故对旅游发展来说,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属于相对外生的政策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故本文利用1998—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多期双重差分法来考察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其背后的可能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1)首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中国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检验了这一影响在国内与国际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差异,为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旅游经济拉动效应提供了经验性证据;(2)基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特征,验证了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带动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为不同地区依据当地实际实施差异性发展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撑;(3)本文同时识别了文化产业集聚政策促进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为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以文促旅”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文化产业集聚区作为文化成果的一种具象体现,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已得到多方共识。多数研究认同文化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地区文化多样性

^①各地对文创园区的称谓不尽相同,例如国家层面称为“文化产业示范(试验)园区”,北京、上海等地称为“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为了统一起见,本文统称为“文创园区”。

发展和地方认同感建立^[6],并为旧城重建、城市形象重塑和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可行渠道^[7]。文化产业集聚能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文化消费能力,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之一^[8]。归根到底,其理论基础来自于集聚的外部效应,即多个创意者或企业集聚所产生的创新力大于各部分相加的总和。

文化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旅游作为旅游发展中的高级形式,已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动机之一^[9]。随着文化旅游概念的兴起,很多文化产业集聚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表征被人们关注。有学者以意大利的马达谷集群为例,探讨了旅游文化集聚区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作用^[10]。相比传统观光型旅游景区,以主题乐园、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形式出现的文化产业集聚区虽然游客数量略有不及,但人均旅游消费和旅游收入均相对更高^[11]。以文化遗产重建为基础的文化集聚区,不仅可以复兴中心城区,有助于保留具有社会意义的自然资产,而且能创造持续可观的旅游收入^[12]。

以上案例与理论研究初步证实,文化产业集聚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或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也有学者注意到,集聚的经济效应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超过这一程度反而会出现规模不经济。文化产业集聚区中游客的大量涌入,使集聚区中的创意企业和艺术家们面临更喧闹的环境,并促使地产价值升级,艺术家纷纷逃离,从而造成了文化内核的被迫外迁等消极影响^[13]。长此以往,这些失去文化内核的集聚区将主要从地产房租方面获益,而对文化产业的成长和区域文化产业优势形成缺乏影响^[14-15]。例如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威尼斯已经面临由于拥堵造成的旅游收入逐年下降的问题^[16]。

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已经观察到文化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对两者之间的积极与消极影响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多数研究

属于规范分析或案例分析,经验性证据相对缺乏。本文尝试从实证角度出发,系统评估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机制,以期为各地文旅融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实证支持。

(二) 研究假设

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区推进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存在共同趋势。自 2000 年以来,各类文创园区在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支持下数量增长迅速。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共有文创园区 2046 个^①,获得省级以上评选称号的文创园区累积达 553 家。观察历年省级评选的文创园区数量增长与国内外旅游收入增长的关系(见图 1),可以发现三者的增长趋势存在一致性。但与国外旅游收入相比,文创园区数量与国内旅游收入的增长趋势一致性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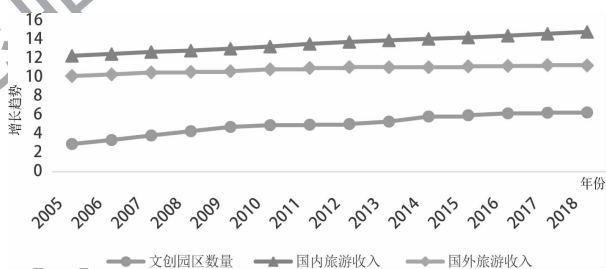


图 1 文创园区数量与国内外旅游收入增长趋势^②

回顾影响国际与国内旅游发展的因素相关文献可知,两者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相关研究认为,汇率政策、对外开放程度、旅游消费结构、交通运输成本、个人收入水平以及一些地区的重大事件对国际旅游需求影响显著^[17-19],而对国内旅游收入影响较大的因素则主要有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水平、旅游产品价格以及休闲需求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等^[20-22]。

综上所述,我们推断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国内旅游可能有较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国际旅游的影响有限。其原因:一是文创园区的评选是中国政府为了促进文化产业集聚而制定的一项

① 数据资料来源于 <http://ccitimes.com/>。

② 为了方便对比,图中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

面向国内的政策,评选及宣传行为集中于国内层面,故这一政策对国内旅游者的影响可能强于入境游客;二是文化产业集聚区不同于传统旅游景点,其对著名自然景观或历史遗迹的倚重性较低,而更注重文化与工业遗迹的改造、地区特色文化资源的汇聚以及文化与休闲产业的融合。国际入境游客一般首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国内旅游者则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休闲娱乐和深度文化体验。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对国内旅游收入影响比对国际旅游收入影响更大。

另外,由于中国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区域的文化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在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建设上,各区域政策推出时间和执行力度不一。截至2018年年末,东部各地均有正式的政策出台,累积评选省级文创园区373家,占全国总量近70%。而中西部地区政策出台时间和文创园区总量均落后于东部,甚至至今一些地区仍未出台专门政策。故我们推断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

进一步地分析,已有研究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教育文化水平等要素对旅游发展有重要作用^[23-24],道路建设、交通网络、城市基建资金、文化教育资金以及城市安全保障等因素对文创园区与城市建设的互动影响程度也非常高^[25]。事实上,中国各地政府意欲通过评选文创园区的政策来促进文化产业的集聚与发展,但在申报评选过程中往往存在重事前申请轻事后建设、重园区形态轻周边基础设施、园区同质化发展等问题。文化产业集聚区想要发挥其对地区旅游经济的带动作用,必须依托其周边公共服务等配套措施的支持。而我国东中西部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差异巨大,可能使得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当地旅游经济的拉动程度不尽相同。故本文推断,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水平和文化水平差异可能造成

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旅游发展的拉动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综上,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且基础设施发展程度等条件越好的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旅游经济的拉动效果越好。

二、识别策略、变量与数据

(一)识别策略

由于各地的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出台时间不一,故本文借鉴多期双重差分法思想^[26],将所有观测值中已出台政策的地区作为处理组,未出台政策的地区作为控制组,建立以下基准模型:

$$Y_{st} = \alpha + \beta \cdot Policy_{st} + \gamma X_{st} + A_s + B_t + \varepsilon_{st} \quad (1)$$

其中, Y_{st} 代表s地区t年的旅游经济增长情况, A_s 和 B_t 表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X_{st} 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ε_{st} 是随机误差项。 $Policy_{st}$ 是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其系数 β 度量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各地区在出台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后,会据此逐次开展文创园区的评选工作,且各地的评选间隔时间不一,每批评选的园区数量不一。故文创园区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此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执行强度及集聚水平。我们借鉴其他学者做法^[27],将 $Policy_{st}$ 替换为s省第t年累计评选的文创园区数量,以进一步检验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对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_{st} = \alpha + \beta \cdot Policy_cics_{st} + \gamma X_{st} + A_s + B_t + \varepsilon_{st} \quad (2)$$

(二)变量与数据

本文所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采用两种方式度量。式(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 $Policy_{st}$ 为虚拟变量,某地区出台政策后 $Policy_{st}$ 为1,政策出台前 $Policy_{st}$ 为0。式(2)中的 $Policy_cics_{st}$ 为某地区第t年累计评选的文创园区数量。一般来说,各地会先出台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再根据政策逐批开展文创园区的评选工作,故 $Policy_cics_{st}$ 相比 $Policy_{st}$ 对因变量的解释或有滞后。

被解释变量 Y_{st} 用于描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水平,本文选用人均国内旅游收入、人均国外旅游收入、人均国内外旅游总收入 3 个指标来衡量。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以 1997 年为基年,利用各省 CPI 指数对其进行了平减。

另外,为了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引起的估计偏误,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对旅游经济的影响^[23],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代理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电力消费量、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人均公厕拥有数量等变量代理基础设施建设程度。(2)服务接待能力无疑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餐饮法人企业个数两个指标。(3)交通运输能力直接影响旅游景点的可达性,本文以人均年末公共交通运营数、人均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和人均旅客周转量来代理地区交通运输能力。(4)地区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以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变量。所有与价格相关的控制变量均进行了平减。

本文采用数据为 1998—2018 年 31 个省份面板数据,所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及旅游发展公报等。数据经剔除缺失样本并取对数等处理后,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依据模型(1)和模型(2)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各地文化产业集聚政策 ($Policy_{st}$) 和文创园区数量 ($Policy_cics_{st}$) 对旅游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区分国内外旅游收入后,该影响出现明显差别。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国内旅游收入的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国际旅游收入的增长反而呈现阻碍作用。

每增加 1 个文创园区,将带动该地区人均国内旅游收入上升近 2 个百分点,但对国际旅游收入无明显影响。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 1,即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有影响,但其对国内外旅游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解释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Y$	人均旅游总收入	521	7.28	1.34	3.42	9.88
$\ln Y_{domestic}$	人均国内旅游收入	521	6.75	2.15	-2.18	9.82
$\ln Y_{international}$	人均国外旅游收入	521	4.56	1.75	0.97	9.22
$Policy$	文化产业集聚政策	521	0.2	0.4	0	1
$Policy_cics$	文创园区数量	521	3.91	13.93	0	128
$\ln 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21	9.69	0.78	8.1	11.45
$\ln open$	人均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	521	4.33	2.23	-2.23	9.09
$\ln asset$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521	9.02	1.02	7.01	10.85
$\ln elec$	人均电力消费量	521	7.67	0.71	6.22	9.65
$\ln tv$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521	4.8	1.17	0.7	6.07
$\ln uc$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	521	1.18	0.47	0.07	2.41
$\ln third$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521	3.69	0.19	3.38	4.4
$\ln hotel$	人均餐饮法人企业个数	521	6.45	1.15	3.77	9.2
$\ln bus$	人均年末公共交通运营数	521	10.09	0.64	8.89	11.87
$\ln taxi$	人均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	521	11.18	0.73	9.85	13.01
$\ln guest$	人均旅客周转量	521	7.12	0.4	6.16	7.82
$\ln student$	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521	13.86	0.74	12.02	15.03
$\ln book$	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521	5.47	0.46	4.56	7.79
$\ln green1$	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	521	1.83	0.75	-0.47	3.52
$\ln green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520	2.13	0.41	0.79	3.02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指标	人均旅游总收入 (1)	人均国内旅游收入 (2)	人均国际旅游收入 (3)	人均旅游总收入 (4)	人均国内旅游收入 (5)	人均国际旅游收入 (6)
$Policy$	0.0408 (0.105)	0.625*** (0.217)	-0.385** (0.180)			
$Policy_cics$				-0.00297 (0.00304)	0.0198*** (0.00628)	-0.00749 (0.00524)
控制变量	√	√	√	√	√	√
时间效应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N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adj. R^2	0.752	0.589	0.571	0.752	0.590	0.569

注:括号中为 t 值,**代表 5% 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地区异质性分析

为了验证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我们在基准回归中分别加入了交叉项“ $Policy_{st} * 是否东部地区$ ”和“ $Policy_cics_{st} * 是否东部地区$ ”,结果如表 3 所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当地国内旅游发展的拉动效应显著为正,但对国际旅游收入和总旅游收入影响均不显著。但就

集聚水平的影响来看,地区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假设2部分得证。

表3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指标	人均旅游总收入	人均国内旅游收入	人均国际旅游收入	人均旅游总收入	人均国内旅游收入	人均国际旅游收入
	(1)	(2)	(3)	(4)	(5)	(6)
Policy	0.0550 (0.121)	0.0943 (0.272)	-0.367* (0.209)			
Policy*东部	-0.0198 (0.171)	1.228*** (0.384)	0.00260 (0.296)			
Policy_cics				0.00651 (0.0105)	-0.00750 (0.0240)	0.00749 (0.0183)
Policy_cics*东部				-0.0110 (0.0104)	0.0159 (0.0237)	-0.0141 (0.0180)
控制变量	√	√	√	√	√	√
时间效应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N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adj. R ²	0.754	0.521	0.570	0.755	0.508	0.569

(三) 机制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文化产业集聚政策(Policy_{st})对国内旅游收入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且这一拉动作用呈现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那么,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借鉴“中介效应”的思想,我们将文化产业集聚政策(Policy_{st})与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的指标(gdp、open)、代表公共服务能力的指标(third、hotel)、代表交通水平的指标(bus、taxi)以及代表文化水平的指标(student)的交互项引入模型(1),以验证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其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依赖于这些指标。然后再以文化产业集聚政策(Policy_{st})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选取以上指标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文化产业集聚政策是否促进了这些指标水平的提升,从而识别出文化产业集聚政策促进地区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

由表4可知,文化产业集聚政策与以上各项指标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文化产业集聚政策是否有效,高度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公共服务能力、交通水平以及文化水平。进一步的,当我们将上述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后得到表5。显然,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这些指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可能对当地服务能力的发展、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教育水平的进步等产生一定溢出效应,进而通过促进这些要素的改善来带动当地国内旅游收

入的增长。

表4 加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指标	被解释变量:人均国内旅游收入						
	(1)	(2)	(3)	(4)	(5)	(6)	(7)
Policy* gdp	1.749*** (0.424)						
Policy* open		0.322*** (0.0907)					
Policy* third			4.554*** (0.952)				
Policy* hotel				0.718*** (0.243)			
Policy* bus					1.970*** (0.367)		
Policy* taxi						1.270*** (0.278)	
Policy* student							3.160*** (0.736)
控制变量	√	√	√	√	√	√	√
时间效应	√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
N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adj. R ²	0.528	0.524	0.534	0.520	0.539	0.532	0.529

表5 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各项指标的影响

指标	经济与开放程度		服务业水平		交通运输能力		教育程度
	gdp (1)	open (2)	third (3)	hotel (4)	bus (5)	taxi (6)	student (7)
Policy	0.0587 (0.0488)	0.264 (0.189)	0.0670*** (0.0205)	0.332*** (0.106)	0.271*** (0.0739)	0.334*** (0.105)	0.0856* (0.0515)
时间效应	√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
N	521	521	521	521	521	521	521
adj. R ²	0.818	0.666	0.408	0.599	0.376	0.032	0.770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推断造成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国内旅游增长的影响呈现地区异质性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服务能力、交通设施水平以及教育水平较高,而文化产业集聚政策是否能有效促进当地国内旅游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这些指标,故东部地区政策效果相对较好。而西部地区的这些要素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国内旅游收入的拉动作用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甚至盲目跟风会阻碍其旅游经济的增长。为了验证这一推论,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中引入“Policy_{st}*中介因素*是否为西部”交叉项构造三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交叉项系数大多为负值,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交通运输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相关指标与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西部地区受到这些关键影响因素的制约,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其国内旅游收入发展不

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可能出现阻碍作用。综上,假设 2 得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一) 平衡趋势分析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由于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出台时间并不统一,依据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平衡趋势检验思想,引入以下方程:

$$Y_{st} = \alpha + \beta_1 * Policy_{st}^{-10} + \beta_2 * Policy_{st}^{-9} + \dots + \beta_{18} * Policy_{st}^8 + A_s + B_t + \varepsilon_{st} \quad (3)$$

其中,处理变量 $Policy_{st}^i$,上标 i 表示政策的提前项和滞后项。 $Policy_{st}^{-10}$ 到 $Policy_{st}^{-1}$ 是政策的提前项,刻画政策发生前第 i 年的政策效果,如果 $Policy_{st}^{-10}$ 到 $Policy_{st}^{-1}$ 的系数接近于 0,说明政策发生前各年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旅游收入没有显著差异,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 $Policy_{st}^1$ 到 $Policy_{st}^8$ 是政策的滞后项,刻画政策发生后第 i 年的政策效果。

如图 2 所示,在政策出台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旅游经济增长水平总体上无显著差异。在政策出台之后,无论旅游总收入还是国内外旅游收入都呈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其中,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这一影响存在上升趋势。这一结果与基准模型的结论一致。

(二) 安慰剂检验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28],本文通过构造虚拟的政策实施时间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即假设各地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均提前 5 年,形成新的解释变量 $Policy(-5)$ 并对其估计。如果仍存在显著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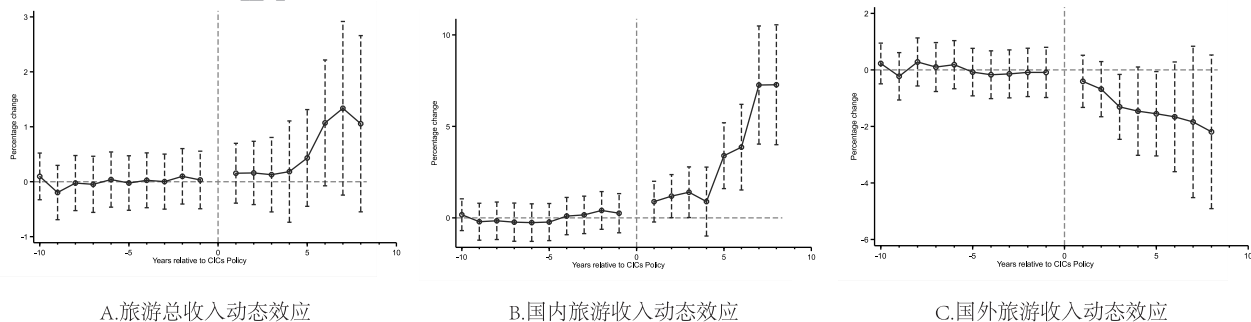
响,那么说明这一效应可能来自于其他因素而非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如表 6 所示, $Policy(-5)$ 的系数及显著性与基准回归明显不同,说明 $Policy_{st}$ 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稳健。

(三) 排除异常值的影响

在文化产业集聚政策的制定上,安徽、陕西、新疆、贵州和西藏 5 个地区虽未正式出台文创园区评选政策,但陆续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进行了文创园区的评选工作,故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能会被低估。我们在样本中剔除了安徽、陕西、新疆、贵州和西藏 5 个地区数据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基本结果没有显著变化。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文创园区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 1998—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产业集聚政策能有效促进地区国内旅游经济增长,但对国际旅游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国内旅游收入的拉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拉动作用高度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服务业发达程度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条件支撑。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服务能力、交通设施水平以及教育水平较高,其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当地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而西部地区这些要素发展水平较低,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对当地的国内旅游收入的拉动作用不能得以有效体现,甚至可能因为盲目跟风而阻碍其旅游经济的增长。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注:虚线表示 95% 置信区间。

图 2 平衡趋势图

表 6 安慰剂检验

指标	人均旅游总收入 (1)	人均国内旅游收入 (2)	人均国际旅游收入 (3)
Policy (-5)	-0.0139 (0.0926)	0.0838 (0.211)	-0.264* (0.160)
控制变量	√	√	√
时间效应	√	√	√
地区效应	√	√	√
N	519	519	519
adj. R ²	0.754	0.507	0.570

本文具有以下政策启示:(1)在国内旅游的拉动上,各地区可以更多地发挥文创园区的作用,加强文创园区的旅游宣传,拓展以文创园区为特色的旅游路线建设,增加园区内的旅游体验项目,有效发挥文创园区的产业优势,以吸引国内游客进入园区参观游览,进行更多的旅游消费。(2)文化产业集聚政策在国际旅游收入拉动上的效果还未充分显现,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文创园区对国外游客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还相对有限。未来在文化产业集聚的建设上,应加强国际宣传力度,融入更多的民族特色以吸引国际游客。事实上,目前一些将民族文化与工业遗产特色、创意艺术特色与商业特色有效融合的文创园区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更大,例如上海的田子坊等。东部地区可以依托其优越的旅游条件,在打造文创园区时充分借鉴这类文化产业集聚的路径和方法。(3)中西部地区在服务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条件未得到提升之前,不应盲目进行大量文创园区的评选工作。其当务之急是大力提高旅游配套服务能力、交通基础设施及教育水平,这样“文旅融合”才能发挥其应有之效果。总之,在当下文旅融合发展的热潮中,文化产业集聚的推进程度应松紧适当,因地制宜,不同区域的建设重点应各有侧重。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如果过度追求其带来的旅游经济收益,可能会导致文化设施拥挤、文化遗产破坏、文化内核削弱等消极后果,这也是未来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应着重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BALAGUER J, CANTAVELLA-JORDA M. Tourism as a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 the spanish case [J]. Applied Economics, 2002, 34(7):877-884.

[2] LEE C C, CHANG C P.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closer look at panel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1):180-192.

[3] 刘晓欣, 胡晓, 周弘. 中国旅游产业关联度测算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基于2002年与2007年投入产出表视角[J], 旅游学刊, 2011, 26(3):31-37.

[4] FABER B, GAUBERT C.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Mexico's coastlin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6):2245-93.

[5] 王慧敏. 旅游产业的新发展观: 5C模式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6):13-20.

[6] SCOTT A. Creative c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 [M]. Spain: OEC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ty Competitiveness, 2005.

[7] HUTTON T. 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 [J]. Cities, 2004, 21(2):89-108.

[8] 厉无畏, 王慧敏. 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模式·路径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11):5-13.

[9] SANTA-CRUZ F G, LÓPEZ-GUZMÁN T. Culture, tourism and world heritage sites [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7, 24:111-116.

[10] ALBERTI F G, GIUSTI J D.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motor valley cluster [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2, 3(4):261-273.

[11] 齐子鹏, 王颖. 创意: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J]. 管理世界, 2015(5):178-179.

[12] World Bank, 1999. Cultur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for Action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99:15).

[13] Richard caves. 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与商业之道 [M]. 孙维,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14] O'CONNOR, JUSTIN, GU X.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s in Shanghai: a success sto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4, 20(1):1-20.

[15] 谭娜, 彭飞.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影响区域文化产业优势形成的实证分析 [J]. 中国科技论坛, 2016(5):97-102.

[16] TOWSE R.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economics [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17] CROUCH G I.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 a survey of practice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4, 32(4):41-55.

[18]钟宇翔,吕怀立,李婉丽. 管理层短视、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抑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6): 163-177.

[19]郑海航,熊小彤. 基于不同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治理——兼论我国国有企业治理[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6): 105-111.

[20]胡元木. 技术独立董事可以提高 R&D 产出效率吗?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2): 136-142.

[21]龙小宁,林志帆.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基本事实、常见误区与合适计量方法讨论[J]. 中国经济问题, 2018(2): 114-135.

[22]CZARNITZKI D, THORWARTH S.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basic research in low-tech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2, 41(9):1555-1564.

[23]HO Y K, XU Z, YAP C M. R&D investment and systematic risk [J]. Accounting & Finance, 2014, 44(3): 393-418.

[24]鲍宗客,朱巍巍. 中国企业的实质性与扭曲性研发——研发企业存在生存溢价吗[J]. 科学学研究, 2017(11): 1691-1699.

[25]伦蕊.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收益—风险退耦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6(5): 109-118.

[26]申宇,赵玲,吴风云. 创新的母校印记:基于校友圈与专利申请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8): 156-173.

[27]胡元木,纪端. 董事技术专长、创新效率与企业绩效[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3): 40-52.

[28]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115-143.

[29]BAUM C F, SCHAFFER M E, STILLMAN 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GMM: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 Stata Journal, 2003(3): 1-31.

[30]黄庆华,陈习定,张芳芳. CEO 两职合一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17, 38(3): 69-76.

[31]余明桂,石沛宁,钟慧洁. 高管个人事项申报、政治风险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J]. 珞珈管理评论, 2019, 30(3): 71-101.

(本文责编:辛 城)

(上接第 75 页)

[18] DRITSAKIS N.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german and british tourism demand for greece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1):111-119.

[19]MUÑOZ T G. German demand for tourism in Spain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1):12-22.

[20]WIPT S F, NEWBOULD G D, WATKINS A J. Forecastin domestic tourism demand: application to las vegas arrivals data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2, 31(1): 36-41.

[21]YANG Y, LIU Z H, QI Q. Domestic tourism demand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does relative income matter?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193-202.

[22]WU B, ZHU H, XU X. Trends in China's domestic tourism developmen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0,12:296-299.

[23]BORNHORST T, RITCHIE J R B, SHEEHAN L. Determinants of tourism success for DMOs & destination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takeholders' perspective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5):572-589.

[24]刘长生,简玉峰,尹华光. 旅游信用、人力资本与旅游产业发展[J]. 旅游学刊, 2009(11):14-21.

[25]梁学成,产城融合视域下文化产业园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7(1):93-102.

[26]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1637-1667.

[27]周玉龙,杨继东,黄阳华. 高铁对城市地价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来自微观土地交易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362(5):119-137.

[28]李贲,吴利华.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8(4):79-97.

[29]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 经济研究, 2017, 52(8):33-48.

(本文责编:王延芳)